

这里的三封书信、两篇文章,是笔者在翻阅抗战时期《华西日报》时,断断续续发现的。它们均未被《李劫人全集》收录,李眉的《李劫人年谱》,以及相关的研究论著,亦未提及。但对我们了解李劫人生平,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1939年5月,日军对四川进行大轰炸后,成都的文化人和文艺工作者,大多随各自任职的机构疏散他往。抗战初期一度颇为热闹的成都文坛,一时间陷入了沉寂和停滞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,“文协”成都分会决定借《华西日报》副刊版面,创办《文讯》周刊,以加强联系和交流,维系会务正常展开。《文讯》原本决定由赵其文编辑,但赵氏因为事务繁忙,临时改由萧蔓若负责编辑。三封书信,就是最初的决议和最后的实际负责人之变的的结果。今天来看,它们完整而真切地勾勒出了李劫人在1940年2月和3月的生活细节,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。

《说昆明》是作者1940年初前往昆明,聘请嘉乐纸厂前工程师梁彬文回川担任厂长的产物。文章分四期,连续刊登在1940年3月24日、3月31日、4月7日、4月14日成都出版的《华西日报》“文讯”副刊上,署名“李劫人”。从文章的副标题“(川滇行之一)”和相关内容来看,作者当时是先到重庆,再经贵阳赴昆明的。在贵阳,曾小有停留,并拟写《说贵阳(川滇行之二)》等。推测起来,可能是因为嘉乐纸厂事忙而打断了写作计划,未能完成。当然,也不排除发表在另外的刊物上而尚未发现的可能。

《乐——为费曼尔女士作》一文,发表在1944年10月8日出版的《华西日报》“每周文艺”副刊上,署名“李劫人”。当时,“文协”成都分会响应总会号召,开展救济贫病作家活动。费曼尔女士为此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,以门票收入捐助“文协”,救济贫病作家。叶圣陶曾在日记中,对这次独奏音乐会的实际情形,作了扼要的叙述:

入夜,与小墨二官三官至暑林街礼拜堂听费曼尔女士小提琴独奏。票资悉数捐入文协之援助贫病作家基金。此会由郭子杰夫妇张罗,售票甚多,可得二十万元。大约费女士之提琴亦有名,听者拥挤,可千人,不得票而退出者怏怏而去。奏琴凡六曲,以不知音者听之,似小品反较大品为悦耳。

日记中提到的郭子杰,即郭守有,曾任成都教育厅长,长期担任“文协”成都分会常务理事,对分会的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。

李劫人这篇文章,从“文协”的工作需要出发,带有为费曼尔女士的音乐会“广而告之”的意思。行文中的随意和枝蔓,与此不无关系。尽管带有“任务”性质,文章仍然表达了李劫人对音乐文化的独特理解。关于初到法国时的生活情形的叙述,更是我们了解其生平事迹的重要依据。需要说明的是,《秋江》《乐记》《平沙落雁》《汉书·礼乐志》《儒林外史》等语,原文均无书名号,整理者根据今天的表达习惯作了处理。“霓裳羽衣”等,因在可加可不加之间,故仍按原文抄录。

原文中难以辨识的字,用“□”代替。原文所无,但根据上下文推断应有的字,则放在方括号“[]”内,以示系整理者所加。不规范的标点符号,和极个别一望而知的手民之误,在最大限度尊重原文和不影响意思表达的前提下,则据当前规范作了调整。

1940年3月6日 致赵其文
其文先生:

原说为《文讯》写二短篇文字,不料二月十九日由昆明重庆跑了一遭归来,去年所患之湿气病,便又发生。这还罢了,兼以右边大牙,动操作痛,历经月余,忍无可忍,冒险就牙“匠”拔去。据说,拔牙之后,必须休息,忽然为嘉乐纸厂[董]事会人说话,东奔西驰,未得一刻宁静。果不其然,数日之后,乃大疲倦,只好回菱窠地休。不料精神尚未回复,而儿子患鼻疾,经名医诊治,说其中有白喉菌。儿子稍好,女子患患急性白喉,迄今一周,又幸经名医治愈。如此不得闲,稍有空暇,又苦于奇痒爬搔。生来本只两只手,以右手最得用,而右手最忙,以故,所谓短篇文字,姑暂请假。

李劫人拜启(三月六日)
1940年3月8日 致赵其文

其文先生:
承询近日生活情况,大略已见昨日短函。今再奉告一事,便是自去年入秋以来,连月好着走路甚为高兴,只是苦了农家。菱窠在东门外沙河堡菱角堰边,堰大三十余亩,往年自秋组夏,垄亩盈盛。从筑窠麦,水干年底,买一五千羊放牧其间,今已破坝可卖十七元。大家没水吃没水用,遂存心打一水井。然而买滥砖破石,每万斤要六十五元,雇泥工掘井,估计需百余工。每工自六角二分上涨至一元四角,然而情势所迫,不能不打,今已打至三丈,仍在掘石填土,还须打若干丈,方能及泉,不可知也。古人谓钱为泉,诚然诚然,无钱即无泉。一回菱窠,便伏土洞边,闻丁丁下锄,又恍惚雷索伯之开苏彝士。

劫人拜启(三月八日)
1940年3月16日 致萧蔓若
蔓若先生大鉴:

十五日函,十六日下午一点许送到,十里邮程,亦可谓快矣。拙稿事实 尊意处理之可也。本来应行寄笔,迨近重负。三月二十六日又将起身赴嘉定,四月上旬可归,俟有余日,再写《说贵阳》。贱恙不能说好,连日以疏肝溶水痛洗,奇痒稍止,手指间流黄水,结血疤如故。菱窠掘井,十四日及泉,泉水涌出,历平日即深六尺许;方正在欣喜,而十五日雨,井周遭土全垮,工友以木堵之,术不验,不顾而去,诿谓运气不好。井深四丈,黄土占多半,红砂石占少半,费工一百〇五个,大约六十余工,穷诸虚耗矣。雨我公田诚可喜,而瞻顾斯井,则又悵悵。专复并颂无恙!

李劫人再拜(三月十六日夜)
说昆明(川滇行之一)

——
昆明是好地方。第一天好,第二湖山好。

《文讯》副刊与李劫人佚文五篇

□段从学



天气好到从朝至暮蔚蓝得有如一泓秋水。我在那里的时候,恰恰是风季,(二十九年二月初正阴历己卯岁之腊月下旬也)偶尔一朵云花被风吹得一丝丝一缕缕绝似漂白砾光的轻絮。正因为风大,所以晶莹的太阳晒到身上,只感觉到如春的和暖。二月一日那天,躺在大观楼侧唐继尧铜像下的草地上,绝对想不到这是应该严寒时候,到处腊鼓鞮鞮催杀花猪的腊月二十四日。

四季如春,又不是绝对的常春,所以除常绿树外,在冬季里也一般的叶落草萎,有四时的变化,便不像热带那样单调。

昆明附近十公里内外,就我所见到的,柏与松最多,而且都很秀挺。其次是灰杨,不算甚高,比较重庆附近山中的为矮,可是比较粗大,城内许多段未拆毁的城墙斜坡上,全是此树。

四乡还有一种乔木,当冬季木叶落尽,细枝紫错树杪,远远望去,很像云海。朋友梁君竟自呼之为云树,到底是什么树,却未问明。

黑龙潭有宋代柏树数株,有三人合抱大,还很茂密,又有唐代老梅一株,大部都已枯死,仅一枝还在着花。著名的滇茶树,这儿已有两株,花确乎有菜碗大,细细一数,确乎也是九心十八瓣,恨树干并不怎么茁壮,与成都状元街原为杨氏花园内的三株比起来似乎尚有逊色。不过杨园茶花到底太老了,每年腊底春初,只管繁华似锦,然而花朵总不甚大,现在杨宅已再易主,而为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印刷所,要是那三株老茶能被保留,毕竟算成都一个特色。

二
“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”,这是昆明大观楼下,孙髯翁的著名长联的起句。

五百里滇池,在大观楼,只能看取一小角,欲瞰其全胜,须到西山。可惜我在昆明,住得太短暂,而且又太忙;朋友们除了按时办公,尚须“跑”警报,不能多抽时间,奉陪到太远处去。其次,还有一个最大原因,便是日常生活费用太高,(许多人每每爱说生活程度太高,意思实在指的生活费用超过了用钱标的,而生活的程度哩,并不见得就在水准之上。例如在巴黎,出必以打克西——街市汽车——代步。此“行”的程度,实在比之坐黄包车者为高;而驰行三四公里,所费不及五佛郎,较之昆明黄包车起码三角,上一公里便是七八角者,其费用则为甚低。又如昆明南屏街昆明大旅社三楼房间,每日房金七元,小费另给,而家具则并不高明,尤其是洗澡在外,近来因为发贵,浴室且不开常,据茶房说,一礼拜内或可洗澡一次,费用不多,而“住”的程度安得谓之为高?此辩明生活费用之高低并无关乎生活程度,二词涵义,实各个不同也)。

不欲过于打扰朋友,又不愿过于浪费自己实等于血液之汽油,以每加仑一十四元四角八分之高价(此二十九年二月五日昆明汽油价值,在前二日尚为每加仑十二元,其后之涨跌如何,自在此文说明的范围以外。)而供我驰驱骛胜,因此,对于西山,只能心向往之,而大观楼的一角,却整整留连了六小时。

昆明湖山实在太美,有名的地方也胜,有些处所,林木的培植也不错,比如中国园林的通病,还是存在,看起来总不顺眼。惟一的大毛病,虽然在人工不够,其实是审美性太差,每一个建筑物不是摆的方位过于错误,就是结构太不考究。例如堆栈式的洋楼,巍然峙立于大观楼之侧,业已刺眼了,而恰恰又做了唐会泽铜像的背景,真有点令人叹气。

城内五华山下的翠湖,也是这毛病。朋友胡君前过昆明,曾寄一信,论及翠湖,诋为臭水一塘。据我看来,所论稍为过甚一点,要是好生布置一下,再多多种些树,将朽败的木桥,更为石梁,再将水面加以清洁,沿湖以外的建筑,稍稍予以归划,虽然不及法国里昂的金头公园,然在中国西南各处的公园中,终可以首屈一指。

中国人对于公共园林的布置,精神都有点不及,这诚然不大妙,但我希望在将来建国大业多少完成之时,精神生活的范围从而扩大。首先是一般能够造作风气的人物,豁然明畅,既不专专迷惘于最摩登的形式,复不要庭草不除,居室不治,块然独坐,大讲其正心诚意的内学,庶几中国园林,至少可以复到平山横塘之盛。

三
昆明也就因为天气常暖,据闻苍蝇绝多。有朋友说,其多不下于亚比西尼亚的海口其布底的苍蝇,幸好我去的时候,正是风季严寒,尚未亲睹其盛,不过从许多地方,也便足以证明人言之非虚。

昆明街面,全是坚石打成大砖形式砌成。我以为比较成都之三合土街面,牢固经济得多。曾记民国十三年,成都初初改修马路时,我便甚以

为三合土之不妙,口头也说过,报纸上间或也说过,主张在灌县选取坚石打成大砖样式数年一翻,可以四翻。四翻之后,尚可修断,即有破溢,更换亦便;自然,木砖街面如上海之南京路,诚然太好,次之如柏油路面,亦何何不豪华?二者不可得,则无宁效法昆明。到底人微言轻,说了还是说了,至今成都街面,其为酥锅魁之皮也如故,安望其不费钱费力,随时修随时溢,而天晴之后,全市



有如灰城!
不过昆明街面,究竟人工还不够,旧的街道被鞋底车辆磨研久了,倒极光滑,而新的则尚待鞋底车轮慢慢的去磨研,这笔费用,未免太大。

中国各处的城垣,无论从哪方面说,(除风水之说外)实在无保留之必要。而城垣拆除,单独将城洞及城楼留下,加以装饰,使其变为好好一座美观的台阁,其下辟为圆场,绕以铁链,取法北平之正阳门,倒是点石成金的作法。昆明之近日楼,本为大南门城楼,便是这样办的。看起来,实在比较成都城门之化为一个大缺口,高明得多。

昆明除了一般旧式房屋建筑以及街上风沙之大,绝似北平外,余如金马碧鸡两道彩坊,也太像北平,只嫌近三四十年的新建筑,大抵多趋于码头格调的“洋”式。其不美观调和,有如在美人素面上去印上一块图案案。

四
圆通寺靠近城的东北,是昆明城内一个很好的游览处。然而据我看来,唐继尧的陵园,或有过之处。唐陵也正在圆通寺之侧的一个山头上。

关于唐氏,除大观楼的铜像外,据我们所知,在昆明城内还有两个地方。其一,是现今的云南大学,以前为唐氏手创的东陆大学,校址在青云街,巍峙于翠湖之北。所据山头,虽不如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之高,毕竟雄伟可观。

大学故址原为试院,一如四川大学文法学院之为旧贡院也。幅员知不及旧贡院之大,而改为大学后的建筑,却远优四川大学。尤其唐氏所建造的那所大楼,其堂皇过于旧贡院内现存的明远楼和至公堂。

其二,即前言之陵园。唐氏埋骨之处,正当一个山头。当面全为云南所产的大理石修砌,气象极伟。园内一部分房屋现租与美国领事作领事馆,别有唐氏藏书之屋一所,书不见多,仅二十余橱。据守者云,尚有一部分藏在别处。唐氏能诗能文,生平颇有抱负。其他不论,单看遗书二十余橱,以及东陆大学之大楼,足见其胸襟。

五
初到昆明,见牛车满路,因而发生两种想头:以牛车本身言,是南国风光;而就车制言,实足想见大略违规,如此陋拙之作,何竟保存至于三四十年,而不变?

牛车之外,复多小马,所驮物皆分载背之两旁。畜运甚多,人运则少,偶见一二,多□□可笑,如运木条,有长至丈外者,亦以一担担之。我想,这大抵由于畜运方便,故人运乃不技巧。四川省内人运之比较技巧,实缘畜运之不发达。这种相对的道理,从四川官道之进退上,大可见之。

昆明市内外运货卡车,以及长途汽车,是相当的多。在没有空袭警报之时,除了不断的飞机练习外,只这一点,可以看得出抗战的形迹,并且是令人极高兴的。

昆明飞机练习是很勤的。尤其当我的几晚,每夜都有夜机声及探照灯的照耀。

滇越铁路终点,距市街不远,长闻汽笛之声,却不曾到站上去参观过。

法国人的势力,在昆明并不显现,东方汇理银行的建筑只简单的有一座两层洋楼,连汉口的日本正金银行的气象都不如。街上的安南人,倒时时可见。金碧路上,安南人的小商店也不少。而南丰饭店的西餐,虽然比一般西餐便宜,每餐仅卖三元,却多少有点法国风味。

六
昆明的生活程度,并不比内地一般高。以清洁整齐而言,似乎比之重庆还有不如之处。而生活的费用,恐怕连今日的香港,也难比其高昂。前面曾略及人力车之贵,这里再稍稍报道点粮食的价值。据我所知,米每担重市称一百二十斤,在二月六日以前,一月底以后,涨至七十八元,并非好米。青菜(昆明人呼之为苦菜,因此有谚曰:云南

三怪,青菜叫苦菜,粑粑叫饵块,女人叫老太)每棵重不上一市斤,价五角;洋芋每枚价三分;猪肉每市斤价一元五角;鸡蛋每枚价一角。正义路三牌坊吃过桥米线(米粉也)一份,花费九角,尚是顶便宜者,其他可以类推。

食行如此,(譬如由昆明城内到黑龙潭10公里,来回人力车费非6元不办;到金殿不过四公里,来回人力车则需四元五角)住也不为便宜。小楼二间,每月租金大抵在六十元至一百元,其他服用皆然。人云在二十八年春季以前,并不大贵,以今比之,殆贵10倍,故许多朋友月入在300元以内者,生活情况都不佳妙。至于昆明本地人之如何过法,以及俸给人员之月入菲薄者又如何过法,以所住日浅无所闻。

生活费用之如此高贵,据云,其理由甚多,而绝非物品缺乏使然,因为在三十公里之外而无外省人旅居之处,便甚中平。

本地产品已贵,而外来货更不消说。姑举一例:在一月底,红锡包纸烟每十枝一包者价八角,到二月四日,涨至一元二角,二月六日,甚至市上无货,这中间自然大有道理,而滇越铁路略有损失,也是一小因。

一句话总结,昆明什么都好,如某人事再弄好一点,不要凡事都照着“九一八”以前之东三省去模仿,再把市政同清洁卫生稍讲求,这里实在是东方瑞士。我希望下次再去,多住些时,再把昆明的美食多发现一些,并且生活过得舒适点,不要令人处处感觉头痛!

乐——为费曼尔女士作

四十八年前,从发蒙入学起,有时也跟着大人们看看戏了。

看戏只为了“看”戏,看花脸,看小旦;看花脸打仗,看小旦做过场,丝毫无兴会于唱,更讨厌的是震耳欲聋的锣鼓铙钹。

所谓清音细乐,也听过;大抵喇叭,胡琴,月琴,三弦,碰铃,七叠盏之类,不管乐器是如何的多,而听去老是一个调子,四上四合,而且一齐是四上四合,也永远是四上四合。

洋琴比较好听一点,而洋琴队中的鼓板,似乎更好。记得洋琴有一出叫《秋江》,又叫《陈姑赶潘》,生旦的唱词,自然不懂,而最懂得的,就只洋琴和鼓板打出的风声水韵。

听着洋琴《秋江》的风声水韵,每次都好像有说说不出的趣味。觉得如此便好,何必再要人唱。同时,就想到某名师的七弦琴。

某名师是当时都抚琴的名师,所畜古琴甚多,且是惟一能够打谱的。据说,他一抚起琴来,真有鬼神仙通之妙,而且不当清凤明月,不到焚香扫花,不遇素心知音,绝不轻弹。但是,有一次,曾跟着他去恭聆了他一曲《平沙落雁》,老实说,除了扣弦时的“仙翁”、“仙翁”,好像有点阵仗之外,其余便只听见一阵那邦的琴子响而已。

文庙里丁祭时的乐,那更难听了!每当用竹片在泥老虎(爨)背上刷。博浪鼓(鞀)摇了起来(播)时,只求满身不发鸡皮疙瘩,便为幸事。若果如《乐记》所言:“圣人作为鼓敔柷敔鼗鼗,此六者,德音之音也。”是真的话,那我无论如何,不佩服圣人,而且也不愿意作圣人,在丁祭夜来受罪!

总而言之,中国的古乐今乐,在我幼年时候,实未给过我半点好感,因而到读五经读历史时,我便大为怀疑了。

中国果真是礼“乐”之邦吗?先王制礼作“乐”,作的甚“乐”?孔子教弟子一以六艺,礼乐射御书数的“乐”,难道其是令人听了而发生鸡皮疙瘩的那种东西,那种玩法吗?且不说《乐记》一篇,把礼“乐”政相互并列出来,谓为“其极一也”,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;即如《汉书·礼乐志》,谓辛延年作新声廿八解,为汉乐之始,以配治德。降及有唐,乐府歌曲,人人好之,霓裳羽衣流通异域,仿佛“乐”确乎又是我们民族曾经爱好过,欣赏过,而只是一代一代的失传,一代一代的演变,愈演愈烈,愈变愈不成名堂,一直变到古乐味,以竹片刷泥老虎的背,而《平沙落雁》只闻绳子邦邦的声,今乐哩,嘈杂,单调,靡废。而我们抱着书本,依然大喊其为“乐”,其实,除了山歌派的“肉”外,全中国无上无下,无雅无俗,就只剩了一把胡琴,说来岂不可怜?

我们姑以古人之言安慰曰,穷则变,变则通,乐至光宣之交,可谓崩矣,穷矣,然则变乎?通乎?变来了,学堂里普遍加了音乐一课,罢除一切管弦锣鼓,采用了日本的脚踏风琴,尺上四合,改了独乃米发,以日本的调子,填入中国的歌词,此之谓科学,此之谓维新,说是这样唱唱,就可以“富国强兵”。呜呼!诚变矣,却还不大通得的罢!

所以,就到了日本化的音乐,我依然怀疑着音乐与人生,依然不相信书本上所说的那些微妙的乐理,以及关于乐的种种说法及逸事,尤其令我狂笑的,是《尚书》上舜命夔典乐,夔自道其能的两句话:“予击石拊石,群兽率舞”。这也如在民国七年时,(其时尚未到过北平,逛过三海,先此声明。)看见朋友所藏的仙山楼阁图,朋友说“是必有所本,绝非虚构”,我则因为游过南方所谓名园,认为必出虚构。盖以所见过的名园而论,总觉得实不副名,而结构而布置而剪裁,总不能如画上之尽善尽美也。

这两种疑惑,可以说,直至民国八年,到法国去后,慰目所接,才给我从根拔出,而发生了两个“恍然”。

第一个“恍然”,在实际上是第二个,关于“目”的,这话说来过长,对于本篇,不免有“喧宾”之势,姑且从略。

且说第二个“恍然”,关于“耳”的。那是初到法国,住在蒙达尔日几个月内的事。

蒙达尔日这小城市,距巴黎只三小时多的火车程途,上月报纸上报道美军杀奔巴黎时,曾提过它的名字,因为是个小地方,称之为蒙达尔日驿,读者自不在意。不过这小地方给我的印象太深,于今二十五年矣,偶一□□,恍惚在夕阳西下,散步整洁洁净的林荫道上,各家窗户微启,不是这家钢琴,便是那家提琴,幽扬婉转,沁人心脾。说实话,我的耳朵也和最大数的耳朵一样,自幼一直到十八岁,所受的音乐训练,上面已经说过,不过是那些,加之以前的师父教训,谓玩音乐唱曲子的都不是佳子弟,不屑接近,说是恐怕花了心不能专心读书,诚知也有真正弹七弦琴,弹琵琶,弹三弦,弹胡琴,以及吹笛子,吹洞箫,拉胡琴的好手们,但是无缘接近,实在那时也不大通行。所以迨与西洋音乐接触起来,倒是提琴较能领受,钢琴哩,则是经过了相当时间,才探到了它的韵味。

其后到了巴黎,接近音乐的机会更多了。最普通的是在夏日下午,各公园各园林中的乐队,冬日黄昏,各音乐咖啡店里的乐队,名贵的如在下午四点至六点峨北纳的法国音乐厅的独奏与合奏,以及各职业的非职业的音乐会等。有一些用不着花钱,有一些花钱也不多。(所谓生活程度高者,谓其享受之程度高,而花费并不一定大,例如在当时之巴黎,听峨北纳之名贵音乐,不过纳门票三佛郎,而咖啡店之音乐并不算钱,所费不过七十五生丁之咖啡一杯,或啤酒一杯而已。又例如民国二十八年时,在北平,包汽车一天,不论远近,连人带油,不过大洋八元,较任何交通工具价廉而迅速安适。苟其所费绝大,而享受毫无,例如今日由内江变黄鱼乘车来成都之学生,有花上万元之多,曾挤立卡车之上,如束薪,日晒则温度高达一百二十度以上,雨淋则裤带亦为之湿,不幸仍须走上四天,时时推车,更不幸到龙泉山顶,必被抛下,以避检查,仍令其背包挟伞,黄昏摸索,步行七十余华里而到牛市口,此只能说是生活费用太高,或生活经济太高,而程度则太低,以其低在坐竿竿下也。)

于是久而久之乃更“恍然”,《乐记》中所论种种,实有至理。而同学王光祈先生之舍政经本行不学,而另起炉灶,以究西洋乐理,遂亦力赞成之。于是亦慨乎中国音乐之丧朽,其末流至采用日本化的东西。其悲观,在百年中实较鸦片烟之役为大。

更于是从而知夫中国之复兴,要在民族之能否恢复音乐之感受!一个民族而失去音乐感受性,可说这民族的其他一切,都将成为问题。因此,前若干年曾发过一个议论,说苗民是将来的一个有望的民族,因为他们还有芦笙,还有跳月之舞。也因此,听见《毛毛雨》《太阳照金姐》等新曲,而大感到中国前途之无望!

可是好事,近十年,我们音乐却大大的推了一步了!这是我国民族的一个转机,不过我想说,我们先不必想恢复我们的古乐,不管琴也好,瑟也好,如其弦子弹起来仍旧只闻绳子邦邦响,玩起来,只闻竹片刷刷响,我们还是姑且全部采用西洋乐器的为是。本来我国乐器自朝鲜的篪篴起,几乎不是外国传来的?今日我们吹箫,名叫尺八,绝非泰国齐王吹的箫,泰国的箫像笙,所以箫笙合奏,箫笙同类都叫参差,都有点像一丛公鸡尾巴,故说能够引凤。(读者注意,我上面几句,只是偶尔想起,随便写写,或许有错,但我有意自吹为什么科学的文艺批评,以及为什么考古的国乐舆论,你们掘起我的祖坟,我也不敢无聊到妄绷什么鸟专家,或是什么鸟大家。我不敢那样无耻!)

我想在音乐空气还没有达到十分时,尚不忙自己制谱,首先我们从空气中去育养音乐天才,要从空气中去给天才以发育的资料,这种培养空气的工夫,不是短时间的事。然而,我从杨云慧女士口中,听见说及费曼尔女士的一生,我又最末了来了个“恍然”,知道使音乐空气浓厚,也不一定需要多少时间,而且中国音乐只管丧失有年,而种子终于存在,只要环境适宜,依然可以勃勃蓬蓬生发出来的。不信吗?我再举二证。

其一,自明初以举国以八股取士。于是凡读书人自五经而外,只读八股,只做八股,大流所及,如徐灵胎道情所咏,如吴木山《儒林外史》所描写,其时之诗词歌赋,举凡关乎性情之作,几目为杂学,真正读书人,是不准治杂学的。然而,我们翻开文学史看,明清五百余年中,诗人词客,岂少也哉。甚至举世不屑的白话小说,也大部大部的产生出来。可见人到底不是泥困,反性情的训练不惟无益,其结果往往还变成了鯨的治水方法。所以,我甚欲劝功举教育的先生们,少干点蠢事,还是学学禹的治水方法罢。

其二,记得某年,曾看见一本什么杂志,载了一段奇谈,据说,在埃及(或是巴比伦)一古坟中,掘出一个瓦瓶,盛有麦粒少许。考其时,已在三千年以上。试将麦粒种下,居然发芽。一粒埋藏三千余年之生机,尚且可以再生,这希望真给了我们不小啊。

不过,费曼尔女士,已不是我国的音乐种子,而是一茎挺壮的苗了,这苗,还正在向开花结实的前途迈进。我因为不认识她,而且也是一个未曾受过训练的耳朵之一,已如上述,故不懂怎样评论她,以及她的本领。好在,快了,十月九日,她有一次演奏会,纪念她那英勇殉国的丈夫,并且将其同情,及于一般贫病作家,会前会后,自然有很多的专业内行去发表专谈,我不过站在旁边,很高兴地说这一篇不落边际的闲话,以为“楔子”而已。

卅三年九月卅日